前言



考古学诞生于 18 世纪的欧洲。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当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有研究埃及的学者同行，在埃及寻访古迹和古物。作为战利品，拿破仑又从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掠夺古物，在法国建立博物馆。他还派亲族统治意大利，并大规模发掘公元 79 年火山爆发时被埋没的庞培城址。这一时期，德国学者开始利用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代遗物，从事欧洲古代史的研究，以弥补古代文献之不足。

19世纪中叶,考古学发展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而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又推动了整个考古学的发展。1819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提出著名的“三期论”，认为史前时期的丹麦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不久沃尔索又把“三期论”用于野外古迹的分期，并以发掘工作中所见的地层关系作为证明。同时，英法学者开始了旧石器文化的研究，1865年,英国学者卢伯克首创‘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名词。当时，进化论已成为欧洲思想界的主流，它为史前考古学打开前进的道路。1856年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化石，被引用为进化论的物证，彻底否定了上帝于公元前4004年造人的神话。

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释读出埃及象形文字,引起了欧洲人对埃及的古迹和古物的极大兴趣。法、德、意等国先后派考察队到埃及各地调查发掘。作为近代考古学形成的重要标志,1866年在瑞士召开了第一次“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国际会议”，这使得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国际学术界得到普遍的承认。

19世纪后半叶开始，考古学的研究出现了空前兴盛的局面。主要表现在类型学的发展和史前考古学的系统化。类型学中，划分器物类型的工作更为细密、准确。除了按照形态的变化把器物排比成“系列”以外，还根据出土的地层关系来确定系列中各器物类型的年代先后。排比不限于某一种器物，而是将许多不同种类的器物分别排比成系列而互相参照。经过排比之后，各种不同类型的器物组合往往可以

代表某一考古学文化。在史前年代学方面，这一时期已经开始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如将旧石器时代文化与冰期、间冰期的划分联系起来，进行分期。

这一时期考古学最重要的发展是发掘方法的改进，真正的、科学的考古发掘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首先是明确了发掘的目的不是为了挖宝，而是要把地下的古迹和古物揭露出来，了解它们原来的位置、布局和后来的变化，这样就可以使由于时间的推移而被灰烬和泥土掩埋起来的人类的历史得到重现。这一时期许多重要遗址的发掘都采用了更为先进的方法，如庞培古城遗址和特洛伊古城址。后者即为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古城。1870 年，由谢里曼开始发掘，他在发掘中除采集全部遗物并注意地层关系以外，还充分做好包括绘图、照像在内的各种记录，并迅速整理资料，及时发表报告。此外，英国的皮特里在埃及的发掘工作中，更讲求发掘方法的科学化。他于 1904 年写出《考古学的目的和方法》一书，总结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在英国，皮特里的前辈皮特·里弗斯则被视为科学考古发掘的创始者。早在 1880 至1900 年，他便已用上述的科学方法在英国克兰伯恩蔡斯地区发掘居住址和古墓。这样，考古学也就被承认是利用实物的证据以探索古代人类历史的一门科学了。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还停留在对金石学的研究阶段，没有人到野外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而帝国主义国家乘虚而入，纷纷派遣探险队到中国西北搞考古调查、发掘,以掠取古物。1898—1899 年，俄国学士院派遣克列缅茨率领的探险队到新疆吐鲁番进行考古发掘，开帝国主义

国家盗掘中国文物之先。1900 年,英属印度政府派遣斯坦因率领的考察队，在新疆发掘了尼雅遗址和丹丹乌里克遗址。同时，瑞典人斯文·赫定率领的考察队在新疆罗布淖尔附近发现并发掘了古楼兰遗址。1902 年,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开始在新疆活动，调查了克孜尔石窟和库本吐喇石窟，窃取了一部分壁画。德国探险队的格林韦德尔和勒柯克也三度来新疆活动，在库车、焉耆、吐鲁番、哈密等地调查发掘，并窃取了克孜尔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大量壁画。 1900 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它文物的“藏经洞”。斯坦因于 1906 年来中国时，从这里骗取了大量写本文书和其它文物。后来法国人伯希和于 1908 年到达敦煌，骗取了写本文书中的精品约 5000 件，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于 1912 年又在此骗取一批写本文书。

外国探险队除了在中国西北的探险活动外，还深入中国内地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如本世纪初，日本人伊东忠太在华北地区进行古代建筑及云冈石窟的调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关野贞于 1906—1907 年调查河南巩县和洛阳龙门的石窟遗迹、陕西的汉唐陵墓以及山东地区的汉画像石；法国学者沙畹于 1907 年调查陕西的汉唐陵墓、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四川汉阙、山东碑刻以及通沟高句丽墓群；1910 年，滨田耕作在旅顺刁家屯进行汉墓调查发掘；1912 年，法国传教士闵宣化调查内蒙古东部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1914 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创办天津北疆博物院，在黄河流域及白河沿岸开展古生物学和石器时代考古的调查工作， 1919 年在林西、赤峰一带发现若干新石器时代遗址。

1920 年在甘肃庆阳北面的晚更新世黄土堆积中发现 3 件人工打制的石制品，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发现旧石器。

中国人自己开始的考古发掘工作始于本世纪 20 年代。1921 年，中国北洋政府聘任的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约请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共同在北京周口店考察，发现了龙骨山遗址，发掘出第一颗北京人牙齿化石。1927 年，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由中国学者李捷和瑞典学者步林负责，开始进行对周口店遗址的大规模发掘。1929 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成立新生代研究室，这是中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新生代研究室委派裴文中负责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并于 12 月 2 日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这是世界人类化石研究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国内外学术界为之震动。随后，裴文中主持发掘了周口店遗址的“鸽子堂”洞穴，首次发现大批人工打制的石英制品，又发现人类用火的痕迹，从而确认北京人文化遗存的存在。1933 年，裴文中主持发掘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发现 3 个完整的晚期智人头骨化石、一部分躯干骨、少量石器和大量装饰品。安特生在发现周口店遗址的同时，还于 1921 年，发现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以彩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并与师丹斯基、袁复礼共同进行首次发掘，由此提出“仰韶文化”的命名。1926 年，当时的清华学校研究院与美国弗里尔美术馆合作，由李济与袁复礼共同进行山西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并发掘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考古发掘，李济将发掘收获编撰为《西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村史前遗存》。

19 世纪末，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引起金石学家的注意，成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随后，刘铁云（刘鹗）编纂的第一部甲骨著录书《铁云藏龟》出版。孙诒让据以作《契文举例》,甲骨学的研究就此发端。从 1913 年开始,罗振玉将所藏甲骨文汇编为《殷虚书契》出版。后又陆续出版了《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后编》以及《殷虚书契续编》。殷墟正式发掘前出土的甲骨资料,以此四书收录最多。同时，王国维发表一系列论著，对甲骨学研究有了较大推进。为了进一步揭开殷墟和甲骨文的奥秘，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派董作宾在安阳小屯村进行试掘，这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开端。自 1928 年 10 月至 1937 年 6 月，10 年内共发掘 15 次,取得了重大收获，丰富了商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资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黄河流域史前时代文化和历史时代早期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在中国考古学最初诞生的一段时间内也取得了重要进展。1923 年开始，安特生在甘肃和青海发掘了许多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并发表《甘肃考古记》一书。将甘青地区的远古文化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六期。他所推定的年代序列，在 40 年代为中国学者所纠正。当时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夏鼐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文化的墓葬发掘中，第一次从地层中找到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的证据。1928 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县龙山镇附近的城子崖遗址发现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

存，即龙山文化。1931 年,梁思永发掘安阳后冈遗址,第一次从地层上判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梁思永还专门撰文进行论证，这是中国史前时代考古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标志，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开创了良好的开端。

在进行大量史前考古研究的同时，中国学者对于各个历史时代的文化遗存也进行了大量工作。除殷墟外，考古学家对于商周时代的不少重要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如 1930 年开始的燕下都遗址的调查发掘，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宝鸡斗鸡台西周墓葬、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战国墓葬等的发掘均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学者还数次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新疆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1928 年开始，黄文弼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了高昌故城、雅尔湖故城及麴氏高昌墓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汉唐时代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迹，又在罗布淖尔附近发掘烽燧遗址。袁复礼在吉木萨尔附近勘察并实测唐北庭都护府遗址。1944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向达、夏鼐、阎文儒在敦煌附近发掘魏晋和唐代墓葬，并考察汉代阳关、玉门关和长城、烽燧遗址，还在武威发掘了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葬。

抗日战争时期，考古学者在后方仍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工作，如史语所考古组发掘了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和五代前蜀王建墓，同时在四川、云南及西北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全面开展，考古学研究取得重要突破。

在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上，首先将 1929 年成立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几经调整、扩充，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恢复了中断达 12 年的周口店发掘工作，又发掘出北京人牙齿、下颚骨、额骨、枕骨等化石，为研究北京人体质形态的发展增加了新材料。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通过这些发现，大大提早了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年代上限，获得了中国古人类进化的系列资料，填补了东北、西北、华南广大地区旧石器发现的空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年代。在探索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传统和复原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生产、生活等方面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此外，在利用同位素和古地磁方法配合传统的地层古生物学方法测定遗址的年代，利用孢粉分析、岩性分析等手段以配合古哺乳动物学来复原古人类的生活环境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到目前为止，全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超过 1 万处，经过发掘的超过 500 处。有的地点经多年连续工作，揭露面积达 1 万平方米以上,有的墓地发掘墓葬多达千余座。较早发掘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以及近年发掘的甘肃秦安大地湾和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等,局部或整体地揭露了各个新石器文化的聚落布局，对了解当时人类生活和社会形态，提供了生动、具体的物证。

在大量的工作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在黄河流域,早期新石器文化过去一直是个缺

环，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的发现是一项新的突破，并且为仰韶文化找到了起源。“彩陶文化”一词已被废弃不用，有关类型概念的提出，推进了仰韶文化的分区、分期研究。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已经给予独立命名，而庙府沟二期文化的确立，解决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直接继承仰韶文化发展的问题。龙山文化已被细加区分，这有利于进一步探讨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与商周文化的衔接关系。大汶口文化是黄河下游的一支新石器文化，它承袭青莲岗文化，后发展成为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以及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均为建国后新发现或重新命名。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序列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新发现的赵宝沟文化、兴隆洼文化以及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等遗存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地区独特的文化面貌。总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基本轮廓日趋明确，地域或时代上的若干重要空白得到填补，对文化类型、主要文化成就和社会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同时注意考察与历史时期的衔接关系。大量发现表明，中国新石器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日渐占有重要的位置。如年代测定方面，放射性碳素断代与考古学固有的断代方法相配合，为中国史前年代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热释光断代的应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通过体质人类学的骨骼测量、陶器化学组成和烧成温度以及物理性能的分析、农作物和家畜的鉴定等，揭示了当时的人种状

况、工艺水平以及生产活动。孢粉分析又为了解当时的自然环境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些都有助于深入开展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商周考古学方面，按照学科发展的要求，提出商文化的渊源和夏文化的探索、殷墟的布局和文化分期、商周都城的形制和发展、商周的经济生活和少数族的文化遗存等一系列研究课题。根据这些学术课题以及其它发现所进行的工作主要有：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二里头文化的确立；偃师商城的发现和发掘；江西新干商墓的发掘；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湖熟文化的发现等。作为这些发掘和研究的成果，出版了一批重要专刊和大量研究报告、论文。这一系列的工作，为商周考古的深入研究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而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随县曾侯乙墓、湖北荆门包山楚冢、燕下都等遗址和墓葬的重要发现，又为这一研究增加了重要内容。

秦汉时代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国势强盛、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密切、与外国交往频繁。秦汉时代文献记载详细,各种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使得秦汉考古具有广泛的课题和充实的内容。新中国成立之前,考古学家在各地进行了不少秦汉墓葬及其它遗迹的调查、发掘工作,但系统的、有计划的调查和发掘是在建国后全面展开的。秦统一六国前后的秦国遗迹主要有秦雍城遗址的调查和发掘；秦公陵园的勘察和秦公一号大墓的发掘 秦栎阳城的勘察和发掘 秦都咸阳城的勘察和发掘 秦始皇陵的调查发掘 云梦睡虎地

秦墓的发掘；北戴河和绥中秦行宫遗址的发掘等。汉代考古取得的重要成果有：西汉长安城址的勘察发掘；东汉雒阳城的勘察发掘；陕西关中西汉帝陵及陪葬墓的调查和发掘以及汉代贫民和刑徒墓地的发掘。同时，各地对于汉代的县邑和聚落遗址进行了大量调查和发掘工作，并全面考察了秦汉长城和鄣塞、烽燧遗址。在新疆，对汉晋时期的楼兰和尼雅遗址也进行了考古勘察和发掘工作。在北方和西北地区，发掘了属于匈奴和东胡族的二兰虎沟墓地、西岔沟墓地、扎赉诺尔墓地、客省庄墓地和上孙家寨墓地；在西南地区发掘了黔西的夜郎墓地、滇池周围的滇人墓地、川西南的大石墓以及岷江上游的石棺墓等。从各类遗址和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大量的遗迹和遗物，是研究秦汉时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的重要资料。遗物的种类包括农作物、纺织品、铁器、铜器、漆器、玉器、陶器、砖瓦、舟车等。这些实物与考古发现的沟渠、矿井、炼炉、陶窑等遗迹相配合，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和各种手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形象资料。而都城与墓葬的发掘，为全面研究秦汉时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是研究当时的都城制度、丧葬制度及其发展演变的重要依据。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表现在考古学上，地方特色比较浓厚。不少遗迹、遗物中佛教文化的成分较多，而且单纯的佛教遗迹很多。建国前，对于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主要着重于对于各处石窟的调查及少数墓葬的发掘。建国后，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不断增多，主要有汉魏洛阳城的考古勘探发掘、邺城遗址的勘探发掘、大同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魏永固陵及司马金龙墓的发掘及咸阳国际机场北周大型墓葬的发掘等。这一时期佛教寺院广布,许多地点发现了众多的佛教文物，如北魏洛阳永宁寺发掘出土了大量影塑，河北、山东、山西许多寺院址出土了大量的金铜及石刻造像。这一时期边远地区少数族及政权的遗迹亦有较多重要发现，如高句丽城址和墓葬的调查发掘、拓跋鲜卑和慕容鲜卑遗迹的发掘均取得了重要成果。

隋唐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期，政治上统一强大，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在中央政权直接统治区的周围，还有一些少数族建立的地方政权，他们与中央政权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隋唐文化的许多方面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它通过陆路、海路交通，同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进行频繁的交往和贸易，国际影响深远。因此，隋唐考古学研究无论在中国考古学还是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建国以来，对于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对于隋唐长安城和东都洛阳城及扬州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和发掘工作。同时对于当时的地方城市，包括州城和都护府或军的所在地也进行了大量的勘察。隋唐帝王陵墓中,对于关中唐十八陵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发掘了昭陵、乾陵区内的一批重要陪葬墓。五代十国的陵墓中,除建国前发掘了王建墓外,建国后又发掘了后蜀孟知祥墓、南唐李昇墓和李璟墓,闽越王钱氏墓等，获得了一批研究这一时期丧葬制度及其地方特征的重要资料。隋唐佛教寺院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发掘了两京及其它地区的一些著名佛教寺院址。其中一

些寺院的塔基地宫出土了大批佛教文物，尤以法门寺地宫中的发现最为惊人。佛指舍利以及众多精美的金银器、玻璃器、秘色瓷等令人瞠目。唐代金银器制造业发达，建国后发现了许多金银器窖藏，主要集中在长安一带，为研究当时的金银工艺水平提供了重要资料。对于隋唐时代渤海、南诏和吐蕃遗迹的发掘调查工作也取得了重要收获。如渤海上京龙泉府和渤海贞孝公主墓的发掘，南诏太和城及藏王墓的调查为研究这些少数族政权的文化特征及与唐代的交往提供了依据。

宋元明时期属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此时民族关系复杂，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北方的辽、金、西夏和元都是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在风俗习惯和文化意识上都有自己的传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他们的文化与汉文化相互交融，因而宋元明时代的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极为庞杂。建国前，外国的考古学者对于北方地区的辽庆陵、辽上京、金上京、元上都、黑城遗址以及一些属于这一时期的地方城市和墓葬进行了调查发掘工作，然而真正较全面的宋元明考古工作是在建国以后得以开展的。其中城市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主要侧重于宋元时代，勘测发掘了内蒙古宁城县的辽中京遗址、辽上京遗址、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明中都城遗址以及内蒙古境内的元代城址。宋元明墓葬的发掘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各地发掘的比较重要的宋墓有：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安徽合肥北宋包拯家族墓、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和福州南宋黄昇墓。辽墓的发掘主要集中于内蒙古、辽宁以及河北北部。如赤峰辽附马墓、

法库叶茂台辽墓、辽耶律羽之墓、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河北宣化辽墓等。金元墓葬主要发掘了河北新城金代时立爱父子墓、河北井陉柿庄金代尹氏家族墓、山西侯马、孝义和河南焦作的金元砖雕壁画墓、山西芮城蒙古时期宋德方、潘德冲墓、大同元初冯道真墓、安徽安庆元范文虎墓、西安元代贺氏墓和苏州元末张士诚母曹氏墓等。西夏陵墓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勘探了银川西部的西夏王陵区，并发掘了其中的 6 号陵及一批陪葬墓。明代墓葬发掘中最重要的是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此外各地的明代藩王墓也发掘了一些。如山东曲阜明鲁王墓、四川成都明蜀王世子墓以及山西、江西等地的明代诸王墓等。

宋元明时代手工业发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瓷器手工业。近年来，对于这一时期的重要瓷窑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如浙江龙泉窑，江西的景德镇窑、吉州窑、福建的建窑、德化窑、河南禹县的钧窑、陕西的耀州窑、河北的定窑和磁州窑、宁夏的灵武窑等。

本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巨大发展及其重大发现，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灿烂的物质文明打开了一个窗口，也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重要资料。读者可以循着古代历史发展的脉胳,去体会各个时期发达的文化内涵,从而进一步提高对于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认识。

远古追踪



追寻祖先的足迹

人类是如何开始他们在地球上生活的第一步的？我们最早的祖先又在哪儿呢？

当“上帝造人”的假说被日益发达的科学所推翻时，人类的历史也从公元前 4004 年一下子延至 200 万年以前。人

们对祖先生活轨迹的探求自此日益强烈起来。

西侯度位于山西省芮城县西北隅中条山之阳，是一个不大的村庄。1959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西侯度村背后的一座土山上——人疙瘩之下的砾石层中，发现了一件早更新世的轴鹿角化石。这一发现，引起了古人类学家们的注意。他们在动物骨骼附近集中注意力，去寻找古人类的遗迹（图 1）。



图1 西侯度遗址全景

西侯度一带，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堆积相当丰富。这里的气候在当时要比现在略微凉爽一些，四季分明，夏季绿草如茵，冬季青草枯萎。那时的西侯度一带，草木丛生，草原和灌木覆盖了整个地区，各种食草类及食肉类动物出没其间。在低洼处，水面广阔，各种水生动物怡然自乐，鲤鱼漫游觅食，河狸从它的洞口机警地探出头来，四处张望。优越的自然条件，给古老的西侯度人提供了生存繁衍的环境。

1960 年，在当年发现鹿角化石的沙层中，三件具有人工痕迹的石块又进一步引起了古人类学家的注意。这三件石

块的边缘上均匀地分布着连续打击的痕迹，这种痕迹是自然力的破坏所无法形成的。尽管这三块石头上的加工痕迹粗糙，但毕竟为古老的西侯度有人类生存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线索。古老的西侯度，敞开了她的胸襟，迎接着科学工作者对人类自身发展足迹的追索。

西侯度的发掘工作是 1961 年和 1962 年分两季进行的。

西侯度人的遗存位于黄河以东 3 公里，在高出黄河河床 170 米左右的阶地上。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集中分布在平均约 1 米厚的交错砂层中，而砂层则夹在早更新世的砂砾层之内。与文化遗物共生的动物化石除鲤、鳖和驼鸟外，还有 22 种哺乳动物。它们包括巨河狸、鬣狗、剑齿象、平额象、纳玛象、步氏羚羊、古中国野牛、粗壮丽牛、山西披毛犀、古板齿犀、中国长鼻三趾马、三门马及双叉麋鹿、步氏真梳鹿、粗面轴鹿等。这些形体或大或小的动物和西侯度人一起生存着，成为他们捕食的猎物。

遗址中发现石制品 32 件，有石核、石片和经过加工的石器。从所出的石器观察，西侯度人已经完全掌握了石器的加工技术。他们运用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将较大的石块击成石片，再按照不同的需要将石片加工成各种工具。我们在西侯度遗址见到了他们曾使用过的刮削器、砍斫器和三棱大尖状器。刮削器是一种小型的工具，有凹刃、直刃、圆刃之分，它的作用类似今日的菜刀，西侯度人用它来加工猎获的动物。砍斫器是一种大型的工具，有单面加工和双面加工两种，这种石器除了加工食物外，还可用于制造工具。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